

阿提加斯与 乌拉圭的解放

〔英〕约翰·斯特里特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阿提加斯与乌拉圭的解放

上 册

〔英〕约翰·斯特里特著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辽 宁 人 民 大 学 社

1974年·沈阳

**ARTIGAS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URUGUAY**

BY

JOHN STREET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9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内部读物

阿提加斯与乌拉圭的解放

(上、下册)

〔英〕约翰·斯特里特著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 1/2 插页: 20

字数: 517,000 印数: 1 26,000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90·6 定价: 2.2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约翰·斯特里特是英国的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他除著有本书外，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有关南美洲历史的学术论文。

《阿提加斯与乌拉圭的解放》一书，出版于1959年。全书以乌拉圭的国家奠基人——阿提加斯的生活和斗争经历为线索，重点叙述了十八世纪末叶以后乌拉圭的历史情况和重大事件；同时，也涉及了乌拉圭1825年独立建国前的整个历史。因此，从全书所涉及的时间和内容来看，基本上可以说，这是一部乌拉圭简史。

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乌拉圭建国的历史渊源，和西、葡、英等旧殖民主义势力对它的历史影响；也为我们在研究乌拉圭现代经济政策和主要政党——红、白两党的历史基础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乌拉圭处于所谓缓冲国的地位，所以通过本书，对于了解它与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等邻国的

1961/08

关系,也会有一些帮助。

作者为写作本书,不仅引用一般的历史著作,也查阅了英国所藏的有关外交历史档案,并曾亲自到乌拉圭与阿根廷等地,搜索档案资料。因此,一般地说,书中提供的文献资料是比较丰富的。但作者从维护英帝国在南美洲的商业利益出发,以大量篇幅叙述英国商人在该地区的活动,用他们的纪事作为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依据,譬如,对阿提加斯就是采取了全面肯定的态度。同时,作者也过分强调英国在拉普拉塔河地区与葡萄牙之间的调停作用;然而对英国本身的入侵和经济掠夺等历史罪恶,却遮遮掩掩。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作者的唯心史观。

原著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是根据1959年版译出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环境	3
(一) 土地与人民	3
(二) 一个无人地区的开发	26
(三) 蒙得维的亚	40
(四) 蒙得维的亚与布宜诺斯艾利斯 之间的情感	57
第二章 阿提加斯的家世	76
(一) 一个拓荒者的家庭	76
(二) 何塞·阿提加斯成了西班牙的军官 ...	108
第三章 道路的分歧	137
(一) 副王辖区受到威胁：英国入侵	137
(二) 副王辖区受到威胁：布宜诺斯艾利斯 与蒙得维的亚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 ...	165
(三) 革命	187
第四章 阿提加斯的崛起	207
(一) 东岸的革命	207
(二) 葡萄牙的威胁重新出现	239

(三) 乌拉圭独立的诞生	257
第五章 从独立到内战	282
(一) 阿提加斯与萨拉特亚, 1812—1813 ...	282
(二) 联邦的危机, 1813	304
(三) 东岸省, 1813—1814	327
第六章 “故国”	349
(一) 东岸省, 1814—1815	349
(二) 阿提加斯“故国”的政府	369
第七章 联邦同盟	421
(一) 联邦主义的传播	421
(二) 阿提加斯的保护领	461
第八章 巨大的灾难	482
(一) 1816年葡萄牙入侵的背景	482
(二) 葡萄牙的入侵	506
(三) 联邦同盟的结局	533
第九章 乌拉圭的诞生	562
(一) 西斯布拉丁州	562
(二) 外交与和平	599
第十章 阿提加斯的晚年	628
附录与史料	
附录 I. 1815年的暂行条例	638
附录 II. 进出蒙得维的亚港船只的数目	644
资料来源	647
索引	668

序 言

本书研究乌拉圭这个国家的创始由来，在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阿提加斯的毕生活动，曾是一股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然而，只讲这位英雄人物的生平，还不能把当时存在的一切推动力量都充分交代清楚，而且，实际上也不能阐明乌拉圭如何建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因为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他已经流亡国外。所以，我不得不详细地叙述了与阿提加斯并无直接关联的一些问题，诸如各帝国在南美洲的互相竞争，以及英国在当地的利益等等。本书不是阿提加斯的传记，它的内容要统一于一个更大的主题，即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我愿意在这里，为我得以访问阿根廷与乌拉圭搜集材料一事，向慨然相助的诸位人士，特别是向尤金·米林顿·德雷克爵士（圣米迦勒与圣乔治骑士勋章获得者），以及乌拉圭之友协会、纪念阿提加斯全国委员会，表示深切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我在乌拉圭逗留

期间,承蒙众位友好关照,心情十分愉快,其中我特别感念卡洛斯·考兰特·阿吉雷、乔恩·E·琼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官员J·G·布鲁顿与D·德·博因维尔,加拿大皇家银行的J·R·皮特和历史学家埃德蒙多·M·纳兰西奥。有关四国档案馆与图书馆职员的大力帮助,值得我竭诚感激;而乌拉圭国家总档案馆的J·C·戈麦斯·阿尔索拉、国立图书馆的迪奥尼西奥·特里略·派斯及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胡安·E·皮维尔·德沃托等乌拉圭人士,为解答我的询问,不辞辛劳,其盛情尤属可感。我也要感谢下列诸位学者:伦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R·A·汉弗莱斯教授和剑桥基督学院已故的J·B·特伦德教授,曾提出宝贵的建议;现在伊巴丹大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Ibadan)任教的J·H·帕里教授和我的妻子,审定了全部打字稿。他们不惜花费时间并慨然予以鼓励的深情厚谊,是我无法答谢的。

本书所发表的意见以及其中可能包含的错误,概由我本人负责。

约·斯特里特

剑桥 1958年12月

第 一 章

环 境

(一) 土地与人民

乌拉圭是拉丁美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不过它的面积却比英格兰加上威尔士还要大得多；同时，它在拉丁美洲总共二十个共和国里，也是属于其中最和平最进步的一个。然而到二十世纪初期为止，这里一直是一个动乱区域中最为动乱不安的地方^①。这种长期动荡不安的状况，其原因大体可以追溯到乌拉圭建国伊始的十九世纪初期，甚至还可以远溯到乌拉圭开始成为殖民地的西班牙美洲帝国时代。

这个国家的全名——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是形容它的位置，正处在南美洲插入乌拉圭河与大西洋之间的那个角落。乌拉圭的北部与巴西接壤；

① S·G·汉森：《在乌拉圭的乌托邦》，第3页。

而在南部，则由汇合了乌拉圭河的拉普拉塔河，构成了她同阿根廷的天然疆界。这种位置，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拉普拉塔河的入口，从而也就控制着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上溯拉普拉塔河的支流——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通往阿根廷、巴西腹地和巴拉圭等处的航道。其次，与乌拉圭的友谊，对任何一个和南大西洋发生利害关系的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最后，她还是介于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一个缓冲国，而这两个强国，论实力，已凌驾于它们的南美邻邦之上，论地位，目前也正在进入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行列。

的确，这种缓冲地位，乃是乌拉圭历史发展中的头等重要因素。在殖民地时代，这块被称为东岸（Banda Oriental——意即乌拉圭河的东岸）的地方，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南美洲的帝国领主彼此不和的原因。乌拉圭的肥沃土壤，那些在连绵起伏的丘陵上吃草，在森林密布的河畔饮水的大群野生牛马，以及她的战略地位，一并构成了引起这种斗争的幕后原因，如果抛开这些，那便是为了一片旷野而相争不已了。

乌拉圭的地势与气候，是得天独厚的。她的水

利资源丰富,除了毗邻巴西那一段之外,在她的全部边界线上,都有良好的港口和便利的水路交通。同时,她也没有阻碍内陆交通的高山、沙漠和沼泽(这些特征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却十分明显)。当一个人从东南走向西北,从易受南极冷风和气流影响的大西洋海岸,走向炎热的内地大陆时,气候也随着从温带逐步变为亚热带。但是,对于白种人和对于牲畜来说,却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常年居住;而且,过去在这个牧草丰美,又没有猛兽的地方,牛畜曾经特别兴旺过。所说的“本地种”,或者“克里奥尔种”未经改良的牛,其实并非土生土长,而是早期西班牙来访者把少数几只牛放出去以后,留下来的野生后代,由于东岸非常适于它们生长,所以还不到十八世纪中叶,据说就已经繁殖到几百万头了^①。

东岸虽然在1516年已为西班牙探险家索利斯所发现,但是过了一百多年,那里也还没有人定居,哪怕是在一部分地方也好。西班牙的征服者们,对这块土地并未发生很大的兴趣,因为住在这

^① P·布兰科·阿塞维多:《乌拉圭的殖民政府与乌拉圭国家的起源》,第35—36页。

里的尽是些原始而好斗的印第安人（索利斯本人就是在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被查鲁亚部落的人杀死的），更确切一点说，无论是这个地区，还是这群印第安人，当时也没有，而且也不生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金、银、家畜、水果、农作物，甚至连可堪使用的奴隶都没有。

虽然如此，东岸却可以向来自西班牙，并溯河前往巴拉圭（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即定居于此）的过路船只，提供淡水和木材。为了这个缘故，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当局，曾多次企图在乌拉圭的海岸上，建立一些小的哨所，只不过由于土人的强烈反对，最初没有成功。至于内地的情况，那就一无所知了，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探险者，敢于到沿海以外的地方去。但是，临近十六世纪末期，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拉普拉塔河彼岸建立起来，向东岸移民的活动，也才随之而开始了。

十七世纪初叶，西班牙感到巴拉圭的行政区域未免过大，因为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它除了巴拉圭本土之外，还包括整个拉普拉塔河流域。尽管，经过四十年前的一次失败尝试，布宜诺斯艾利斯终于在1580年建立起来了，因此在1618年，它的全

部领土就被划分为两个直辖区 (gobernaciones)：一个是巴拉圭，由亚松森统治；另一个是拉普拉塔河地区，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都。东岸被划归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然而这区区的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有什么能力把当地的移民定居工作承担起来，这倒是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奇的^①。

同印第安人的友谊关系，开始时是用赠送礼物和款待的办法来培植，接着又派出属于圣芳济会的少数和平传教士，为更长远的接触开辟道路。1624年，他们在乌拉圭河下游，靠近内格罗河口的一个名叫圣多明戈—索里亚诺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布道村，当地的查那 (Chanás) 小部落，接受了基督教和与之俱来的西班牙统治。不过，那种强制推行耶稣教会的严格教律，即通过传教使之归顺的尝试，虽然在巴拉圭的布道区行之有效，但在此地却遭到了失败，因为西班牙的移民者，跟在传教士的身后，匆匆忙忙地赶来，并

① 此时拉普拉塔河地区直辖区人口：白人有2,730人，友好的印第安人有4,899人。该辖区包括现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圣非、恩特雷奥斯各省，也包括乌拉圭 (J·托雷·雷维略：《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届统治者 (1617—1777)》，载于《阿根廷国家史》，第3卷，第2部分，第8章，第468页)。

且把邻近的地方都给占据了；嗣后，住在同一村落里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不可避免地发生血统混杂，结果查那部落很快就把他们种族的特征，连同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一古脑儿丢掉了。圣芳济会的传教士们，在拉斯一比博拉斯和埃斯皮尼略，建立另外的布道区，但是西班牙征服者那种典型手段，即确保土人纳贡和服劳役的监护制（*encomienda*），在此处并未得到发展，因为那些还没有跟查那族一样完全被同化的部落，都过于野蛮而无法建立任何形式的文明生活，他们自由放荡惯了，对待定居的移民，总是断断续续地抱着几分敌对的情绪。

西班牙人完全是因为大量牛群的发现，他们才被吸引着，导致向东岸其他地区进行探查，而逐渐扩大占领范围的。在这一发现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们，一向只把东岸看成是木柴和木炭的来源地。因为在拉普拉塔河彼岸的阿根廷，缺乏天然木材，所以他们迫切地需要这些东西。不过，早期探险者带来的牛，其野生后代既然已经繁殖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就觉察到，把东岸作为牛皮、牛脂、脂肪和屠牛业其他产品的一个来源地，比把

它作为燃料的贮存地，还要有利得多。于是，牛就成为拉普拉塔河地区唯一的重要经济资源，而东岸也以是一个产牛最丰富的地区出现于整个直辖区之中了^①。

十九世纪初叶，一位苏格兰旅行家 J·P·罗伯逊，曾对这项原始工业的一个中心，做过一番描绘，尽管这个中心位于阿根廷统治下的圣非省，但是，那种气氛仍然可以代表许多地方。他写道：这个地方

不妨叫做牛群的葬身之地(Golgotha)^②，因为我发现散在各处的不仅有它们的头骨，而且还有它们的尸体，屠宰场和牛栏，简直把这个地方给团团包围起来了；或者不如说，它们并非环绕着城镇，反而是城镇的一个组成部分。地上浸满了牲畜的血迹；丢弃的烂肉、高大的牛皮垛以及牛脂加工厂的臭气，在烈日毒照之下，以十倍的强度散发出来，真

① 关于牛的分布，见布兰科·阿塞维多：前引著作，第33—35页；阿提加斯档案全国委员会：《阿提加斯档案》，第11卷，第9—10页，J·E·皮维尔·德沃托序。

② Golgotha：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位于耶路撒冷城附近。——译者

叫人有点受不了。那些牛栏所在地的上空，被一群猛禽遮得一片乌黑。兀鹰、吃腐肉的乌鸦和鸥鸟，环绕被屠宰了的牲畜尸体盘旋、飞掠、打转。这里有一头牲口，已经向屠宰场的高卓人行刑手，交出了它身上的皮和油脂（人们认为在它全身之上，只有这些东西才值钱），十来个吱哇乱叫的攻击者，正在投下它们的利爪，把它们的钩形尖嘴插到余温未尽的肉里去。那里，有那么多猪争夺这场闹宴的首席，旁边，几条饿疯了的狗，在夺取并维护着对捕获物的独占权。鸭子、鸡、火鸡好象只愿吃牛肉，而不愿吃别的；象这个飞禽走兽异类同居的家庭，当它们贪得无厌地满足其本能欲望时，所发出来的这种呱呱、咯咯、汪汪、呜呜的嘈杂声在巴别塔^①以外的地方，是从来也没有听见过的^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建立征税制度，从这个

① 巴别塔(Babel)：乃是古代拟在巴比伦修建的通天塔，因触怒于神，使人们的语言发生了混乱，结果未能建成，故事出自圣经《创世纪》，第11章。——译者

② J·P·罗伯逊与W·P·罗伯逊：《巴拉圭信札》，第1卷，第226—227页。